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着重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九年时期

根据国务院档案编辑

##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

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刷

\*

195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1,200,000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0015 定价: (上下册) 4.20元

## 刊印說明

我們翻印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  
國務院出版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作為內部研究的參考。

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七年九月

## 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

為遵照你的願望，我已編纂好我們對華關係的紀錄，尤其着重過去的五年。這個紀錄已予公佈，且因此將到達美國國會與美國人民手中。

這個編纂品雖然篇幅浩瀚，但它只能包括中美關係的一個比較小的部份。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中美關係曾牽涉到政府許多部門和組織。那段時期內的整個歷史紀錄的編纂工作，並不能說已經完成，由於目前一般人之密切注意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不能等到根據國家軍事部門，財政部、租借總署、白宮的檔案和其他官方紀錄，作一完全之分析後，才發表這個紀錄。然而我已指示那些負責編纂這個文件的人，提出一個紀錄，這紀錄將表明在這個期間決定我們對華政策和反映執行這個政策的顯著的事實。這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一生最不愉快的時期中，極端複雜的問題的坦白紀錄，而對於這個大國，美國早就有着最親密友誼的聯繫。（編纂這紀錄時）沒有一個可用的項目，因為其中含有批評我們的政策的語句，或可能成為將來遭受批評的基礎而把它省略掉。我們制度固有的力量，是政府對於有識見又好批評的輿論之感應性，正是此種有識見又好批評的輿論是極權政府，不論右派或共黨，所不能忍受且不寬容的。

美國人民與政府對中國的關切，可以在我們的歷史上追溯到很遠的時期。儘管距離及背景上的廣泛差異，把中國和美國隔開，但結合中美兩民族的宗教上、慈善事業上以及文化上的聯繫，常使美國對中國的友誼加強。這種友誼是可以利用許多年來的種種事實予以證明的。諸如利用庚子賠款供中國學生的教育費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的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及戰後的廣泛對華援助等。這個紀錄證明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種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的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在編纂此種紀錄時，為尊重事實真相計，以致必須公佈種種事實，因而揭

露該国不幸的局面，这实在是一件遺憾的事情，然而我並不認為由于这种原因便可以中止公佈。

閱讀这个紀錄时，應該注意到各項事件發生时的环境。例如我們必須記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过程內，在打击德国和义大利的努力中，我們是和苏联結成同盟的，並且我們当日的政策的主要目的，便是要在战争之进行具有真正价值的时候，使苏联参加对日本的战争。在这时期，对军事的考虑，自然要超过对所有其他問題的考虑的。我們在远东最急切的目的，便是击败共同的敌人，並保全我們將士以及我們战友的生命，中国人包括在內，如果我們循依任何其他途徑，則我們当已不能履踐我們明示的責任。

对日战争胜利后的几年中，正如同珍珠港事件發生前的几年一样，我們最恳切的願望，在于协助中国人民获致和平、繁荣与內政上的安定，军事考虑則在其次。为促进这些目的，我們政府所採取的决定与行动，不得不以当时所能获得的情报为根据。在这段可悲的整个期間，我們充分地理解到美国的物質援助，军事与技术援助，以及善意不論如何丰富，她們本身却不能使中国站立起来，究極言之，只有中国本身才能够使她自己自力更生。

在形成現代中国之命运中，有兩個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紀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負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須面臨的第一个問題，是解决人民的吃飯問題，到現在为止，沒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国民党曾企圖用制定許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以謀解决这个問題。这些法律中有的失敗了，另外則遭忽視。国民政府今日所面臨之窘境，大部份正为了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給中国民食，中共宣傳的大部份，就是由他們將解决土地問題的諾言所組織成。

形成現代中国之命运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西方以及西方观念給予中国的影响。三千余年来，中国人發展他們自己的高度文化与文明，多半未受外来势力的影响，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后，中国人还往往能在最后制压鎮服並同化侵入者。因此他們自然会自視為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現。在十九世紀中叶，这座孤立的到那时为止一直不能通过的牆，被西方突破了。这些外来者帶來一种进取性，独一无二西方技术发展，和一种为以前的外国侵入者所未曾帶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份因为这些性質，一部份因为滿清統治的衰微，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为中国人介紹了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在刺激，騷乱

和社会变革方面佔了一种重要的地位。

二十世紀初，人口过剩和新观念的联合力量，發动了那一連串的可以称为中国革命的事件，这是在有纪录的历史中最震撼的革命之一。它的結果和后果，現在还仍有待于預測。从这个革命的漩渦中出現了国民党，最初以孙中山先生为領袖，后来以蔣委員長中正为領袖，負指导革命之責。国民党的領導权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遭受中国共产党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是二十年代初期在苏联革命的观念形态的影响下組織的。我們应当記得，苏維埃之理論与实际，对于孙中山先生之思想与原則，尤其是經濟方面与党組織方面，有相当的影响。应当記得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一直到一九二七年。那年，第三国际要求在政府和軍队里佔据一种优越位置。是这个要求，促成了国共分家。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間的历史中，大部份的史实，是国民党与中共間的爭权，而后者显然居于下風，进行一种無希望获胜的战斗。在这一期間，国民党在努力統一国家，並在建立国家財政經濟实力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九年）这十年的某一段期間，国民党失掉了当初創立該党的动力和革命热情，而在中共方面，这种热情成为了一种狂热。

也許主要因为中国（建設），获有进步，日本选择了一九三七年为征服中国本部的出發点，而驅逐一个殘忍的可怕的侵入者，也就成为中国人民的目标。战争初期，中国人民之抵抗日本，博得全世界爱好自由人士，对中国人民表示無限的欽佩。中国的抗战，一直到一九四〇年，並未得到大量的外力援助。这些年战争中，至可悲痛的一件事，在于物力与人力受到重大的破坏，以至毁灭了一大部分的、正在抬头的中等阶級，而这个阶級在历史上曾为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骨干与中心。

对日战争期間，国民党与中共領袖間之利害不同，与中国人民的团結一致，是背道而馳的。至四十年代初期，事实趋于显明，政府領袖和共党領袖一样，仍然專心于内部之爭权，正如他們之專心于对日战争一样。自从美国参战后，国民党即深信日本終將被击败，並看出有一个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以和中共作最后决斗。共产党方面，在中国的混乱中，似乎看到一个机会，去控制全中国，而这种机会，是抗日战争前他們所不能获得的。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之部分瘫痪，大部份是由于这种爭权。

正在此点上，美国对华政策上两个基本原则——不干涉中国內政，以及支持中国之統一与領土完整——發生了冲突，其中

之一，也与盟国对日战争之基本利害冲突。一九四三年与一九四四年間估量，除非中国人能把比較大的统一的对日抗战的利害关系，放在他們的内爭的利害关系之上，中国的抵抗，或将成为完全無效。日本可能于对日战争的结果还不能分明之前，在中国夺去盟国的宝贵基地、作战据点和人力资源。在此种情形之下，並鑒于作战上的最高需要，而此时中国的利害和我們的利害，同样悬于此次大战的结果，因此傳統的对华政策的原则，不得不改变，以适应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局势。

珍珠港事件后，我們扩充了早在一九四一年在租借法案下所創始的軍事經濟援助計劃，租借法案援助計劃，詳見本書附件第一章里的援助計劃項下。它的量远較我們所希望的为小，因为在这世界規模的战争中，各戰場对美国都有巨大的要求。又因为对中国运输困难，当时中国的港口已悉数被敌人佔領，虽然如此，租借法案計劃下运华物資的数量，还是相当大的。

我国政府派往中国援助推行战争的代表，軍事的与非軍事的，不久就發現了正如前面所述的，在这个長期斗争中，已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政府，不仅在軍事上，經濟上削弱了中国政府，而且在政治上和士气都受了影响。从美国軍事和外交官員的报告透露出来，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間，使人愈来愈深信，政府与国民党显然已失掉在抗战初期使他們贏得人民忠誠的宛如十字軍的热誠精神。据許多观察家的意見，他們已經日趋墮落腐敗，沉醉于夺取地位、权利。日漸趋于依賴美国为他們贏得战争的胜利，和保留他們在国内的优越地位。当然，中国政府一向是一党政府，而不是在西方意义下之民主政府。战争的压力与紧张，現在已迅速地削弱了它所已有的自由份子，而增强与过去軍閥無法区别的反动份子的权柄。中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也就逐漸在消失之中了。

在我們看来，显然只有一个新生而进步的中国政府，才能重新获得人民热誠的拥护，才能有效地和日本作战。美国官員會屢次把他們对这种情势的关切，提供給蔣委員長注意，他也屢次向他們保証，將予以糾正。可是他很少或者並未作有效的努力去糾正，並漸漸閉門不納那些向他作逆耳忠告的中国官員。若干美国观察家（本書附呈的紀錄中也引用了他們的报告）除了关切中国中央政府这种頹廢对作战必有的影响而外，他們还关切国民党的这种每况愈下势必影响到它最后与中共政治或軍事的斗争。他們在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四年便担心国民政府設若如此自絕于国人，自己脫离人民，則在战后竞争权力时，恐即無力維持其权力。尽管如此，我們为了显見的理由，仍旧傾全力援助国民政府。



当然，这是联合从事对纳粹德国之战，美苏间虽产生某种程度之合作的时期，罗斯福总统决计尽力把这种在战火中锤炼出的合作延續到战后。举世人民既厭倦于战争的暴行恐怖和墮落，也有此願望。一直到战后数年中，才証明世界同盟中一大盟友，即使过去确曾为（合作努力）的，现在似已不再追求这个目标了。

一九四四年赫尔利少將被罗斯福总统派赴重庆时，他發現国民政府和中共双方都具有他所認為的一种意願，願撇开他們之間的歧見，共同合作努力，为此，他們也曾不断作过零星的嘗試。

前此及后此，斯大林元帅都曾向赫尔利將軍保証，除了以蒋介石为領袖的国民政府而外，苏联無意承認任何在華的政府。可以注意的是，大战最后数年及其后一个时期中，斯大林元帅曾向美国官員重申这意見。他和莫洛托夫曾表示，中国应視美国为其援助的主要可能来源。斯大林所表示的这种情緒，大部份包入于一九四五年的中苏条約中。

由于与苏联的战时合作及代价高昂的对日战争，遂产生了雅尔达协定。美国政府与人民都以異常焦灼的心情，等待对日本本島的攻击，这场攻击恐怕得以死伤达一百万美国兵員的代价，才可把日本征服。那时原子彈还未成事实，若不作此攻击，远东战事，似無結束可能。因此，如何使苏联能早日及时参加对日之战，便成了美国政府当务之急了。因为这样才可使滿洲日軍，不致在战争的严重关头，調回日本本国。美国政府不仅認为苏联参战，在所必須，並且必須在我們进攻前加入。我們已決定一九四五年秋天發动攻势了。

斯大林元帅在雅尔达不仅同意在欧战胜利日后二三月内进攻日本，並且將其关于滿洲的「价錢」，實質上只限于一九〇四年以前俄国在那里所佔有的地位。在我們这方面，为了取得这一許諾，使战争得以結束，以拯救美国、中国及其他盟邦人民的生命，准备而且已經付出了这笔必要的代价。可是在这方面，有二个事实不可忽略。第一、在苏联最后果真参加对日之战时，则在任何情形下，不管我們的态度如何，她都可能佔据談到的一切領土，以至更多的領土；第二、苏联方面，由雅尔达協議而締結的中苏条約中，同意予国民政府以道义的及物資的支援，且正式以条約的方式，保証不干涉中国內政。后来虽因日本抵抗的崩潰，出人意外地早，使雅尔达协定中若干条款，看来並無必要。但就当时所預測的战争过程看，則这些条款不仅合理，而且显然是對我們有利的。雅尔达协定及随之而来的中苏条約，虽出于軍事必需而締結，但事实上是对苏联在任何情况下所能採取

的行动，加以限制了。

为了军事安全的理由，也仅是为了这些理由，美国政府当时认为，若与国民党政府磋商雅尔达协定事宜，或立刻把协定条款通知重庆，都太危险。那时我们正进行太平洋战争，觉得若在这时把秘密情报拍往国民政府首都，有几乎立即被日本人得到的严重危险。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沒有理由去招惹与安全有关的危险。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才授权赫尔利将军，把这个协定通知蒋介石。

一九四五年七月，中苏两国遵照雅尔达会议上苏联同意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的协议，开始在莫斯科谈判。谈判过程中，美国觉得须提醒双方缔结该约的目的，是实行雅尔达协定——不多也不少——以及苏联的若干提议，已超过协定条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订，国民党中国和美国都普遍表示满意，认为苏联接受了对其在华活动的确切限制，并承诺一切援助不给予中共。可是是年九月十日，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却警告我们，不要过份相信苏联会遵守该约的精神或字面。苏联政府以后在东北的举动，充分证明这个警告具有理由。

和平来临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下列三种可能的抉择：（一）完全摆脱；（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努力使双方得一妥协，以避免内战。

第一种抉择，無異在我们从事有助的坚定努力前，放棄了我们的国际责任与我们对华传统的友好政策。我相信当时美国的民意也有如此的感觉。第二种抉择，在理論上可能迎合人心，但是事实上是不能实行的。大战前的十年当中，国民党沒有能力摧毁共党。大战后，如前所述，国民党的力量業已削弱，意志消沉，不得民心，国民党文武官員在日本手中收復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而在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力量則較过去任何时期为强大，且已控有华北的大部分。由于国民党部队的無效能，这点后来已表现出来，令人慨歎不已，也許只有靠美国的軍力，才能逐走共党。美国人民显然不会認可我們軍隊在一九四五年或以后肩負如此巨大的义务的。我們因此只有走上第三种抉择，在这政策下，面对现实，企圖协助拟定一个暂时性的协定，以避免内战，並保持甚至增加国民政府的势力。

一如纪录所示，在赫尔利將軍使华以前，中国国民政府即已經採取步驟，希望和共产党成立協議。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

蔣委員長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詞時便說：「我們應該清晰地認識，共產黨問題是一個純粹政治問題，而應該循政治的途徑，以謀解決。」其后他曾迭次重申這一觀點。國共代表之間商討軍事合作與民政問題的綜合性談判，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便在西安開始。後來從一九四四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赫爾利大使是應兩方面的邀請，參加協助其事的。談判繼續進行了一年半之久，終沒有獲得最後的結論。而在赫爾利大使離華以後，馬歇爾元帥來華以前，即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獲得了一串對於原則上的綜合性協議。惟同時雙方部队的衝突，有增無已，並危害協議的執行。除非談判很快的達到成功的結論，普遍內戰的危險是十分急迫的。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馬歇爾元帥于一九四五年底首途使華。

誠如本書第五、第六兩章中關於馬歇爾使華及其以後幾年的事實敘述所示，我們當時的政策是針對着兩個目的而進行的。一個目的是在使政府能趨于穩定，並沿着民主的途徑而前進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另一個目的是協助國民政府，儘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它的權威，事實證明，第一個目的由於雙方都不願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實現的。中共拒不接受凡足以削減他們一貫堅持的目的的各種條件，即拒絕接受防衛中國赤化自由的條件；國民黨方面，則迷惑一個錯覺，不顧及美國軍事代表迭次所作的相反建議，意謂用武力可以摧毀共產黨。

至於第二個目的，援助國民政府，是我們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所力予推行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友邦已經獲得承認的政府，我們的友誼以及我們根據國際法的權利，都要我們以援助給予政府，而不給予企圖傾覆與推翻此一政府的共產黨。我們援助國民黨控制下的中國的程度，詳見本書附錄中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各章，固勿須在此贅述。從一九四五年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初秋，國民政府在人力和軍備上較其對手具有顯著的優勢。的確在那一時期之內，很大一部份由於我們在運輸、武裝和補給上給予他們的部队的援助，他們始能推廣其控制及于華北和滿洲的一大部份，直到馬歇爾將軍于一九四七年初離開中國的時候，國民黨在軍事的成就上和領域的擴張上，顯然是登峯造極的。然而其后一年半的事實顯示，他們表面上強大的力量是虛幻的，他們的勝利是建立在沙一般的基础之上的。

危機發展于滿洲的四週，該處是俄國和日本的帝国主义的傳統上競爭的焦點。斯大林元帥曾在多次場合確切表示，他期望國民政府來接收滿洲的統治權。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的停戰協定內，中共同意為了恢復中國在滿洲的主權，由政府の部队開

入滿洲。按照這一諒解，美國運送了相當龐大的政府部隊到滿洲進口處的各港口。在此以前，蘇軍曾表示將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內撤出滿洲。可是後來又應中國政府的請求，多留了兩三個月。當蘇軍真正開始撤退的時候，國民政府發現自己有着漫長的交通線，有限的火車車輛和不够充分的部隊，這些部隊實不足以及時接收撤退下來的地區。以阻止已經佔領着乡村的中共部隊的進入。當共產黨進入之時，他們得到了日本關東軍留下來的大量物資，這些東西，是蘇軍方便地加以放棄的。為了应付這一局面，國民政府發動了一連串軍事行動，將其所駐有的界線推進到松花江。在這些軍事行動將告結束的時候，國民政府在北境內也開始了戰事行動，終於把共產黨佔領的區域予以縮緊。

一九四六年春，馬歇爾元帥企圖恢復和平，這種努力历时几个月之久。在這種努力的过程中，一連串好似永無底止的建議案和反建議案相繼提出。這些建議並未中止軍事行動，同時也沒有獲致政治的解決。在這些談判當中，馬歇爾元帥顯示出他無限的忍耐力和机智。為了達到協議，不惜一而再，再而三，作嘗試，以期達到協議。然而他逐漸深信，兩黨間繼續綿延的內戰達二十年之久，而其領袖人物始終一樣，已造成個人間深刻的偏激，與水火不相容的歧異，致使達成協議成為不可能。猜忌和缺乏信任已經無法补救，馬氏于是相信雙方僅是為了爭取時間，為了爭取軍事地位而施用計謀，以暫時迎合他們所認為的美國人的願望。馬歇爾元帥最後獲得結論，他赴華的目的沒有實現的希望。

雖然在實際上馬歇爾元帥在一九四六年秋撤回了他的協助和平解決內戰的努力，但他仍然在中國，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爭論的焦點之一，曾是為了召開國民大會，替中國制訂一部新憲法，並結束訓政時期和一黨專政時期的問題。共產黨堅持軍事問題必須先行解決，否則他們就不參加國民大會。蔣委員長則決定國民大會應予召開，計劃應予實施。在一九四六年的最後几个月當中，馬歇爾元帥希望，他留在中国，將鼓勵中國非共產黨區域的自由份子，較過去更有力地發揚他們的力量，並對反动份子和贖武份子所實施的專制，發生一種感化的發酵的作用。馬歇爾元帥留在中国，直到國民大會完成了它的工作。雖然擬議中的政府新體制似乎还差强人意的，惟事實昭然，在力量的對比上，甚少改變。

馬歇爾元帥在告別聲明中，宣佈他終止協助中國恢復國內和平的努力。他認為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間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是求問題之解決的最大障礙。他明白表示，拯救中國的機會是操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新制定的憲法，雖為一個民主的中

国确定了它的体制，但双方在实际中所採取的實施办法，將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考驗。他呼吁朝野的自由分子出面領導，他認為这样才能走向团结与和平之路。当發表了这一最后声明之后，他便回到美京华府，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就任国务卿新职。

总统（杜魯門）鑒于急迫災禍的跡象，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份，依照国务卿的建議，訓令魏德迈中將前往考察中国的局势，並提出建議。魏德迈將軍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提出的报告中，他建議繼續並扩大其援助国民党中国之政策。但应基于下列几个条件：

一、中国將其要求援助的請求，告知联合国；

二、中国要求联合国促成滿洲的停战，並請求將滿洲置于五强的监护或托管之下；

三、中国应利用其本国的資源，改革其財政，改革其行政与軍隊，並于經濟及軍事方面，延用美国顧問人員。

魏德迈將軍的报告，充分認識到共产党統治全部中国的危險。並对国民政府的各項問題表示同情。不过他列举了一大串的改革建議，在他看来，如果国民政府要复兴它自己，那么这些改革都是必要的。

我們决定，在那时候公佈一个主張，把中国的一部份从国民政府的統治下分割出来，並將那一部份置于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机构之下的建議，是沒有什么裨益的。在本書所附的紀錄內，关于魏德迈將軍討論中国局势的报告那一部份的全文，已收录于本書內，列为第六章附件。

中国国民政府失敗的原因，在所附紀錄文件中，有相当詳尽的叙述，这些失敗都不是美援的不充分造成的。我們在中國的軍事观察家曾报告說，国軍在具有决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內，沒有一次战役的失敗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彈药，事实上，我們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現象，已經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領袖們对于他們所遭遇的危机，是無能为力。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产党則通过一种严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热忱，企圖使人民相信，我們实为人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国民党的部队無需别人来击败他們，即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証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丧失了士气的軍隊，是經不起战斗的考驗的。

本書無法將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年头內的全部历史和發展，作同样詳尽的叙述。其主要原因是我們和国民政府有着正常的外

交关系，有从我們駐在他們的領域內的各个代表获得大量报告的方便；但我們和共产党之間直接接觸，則主要只限于赫尔利將軍和馬歇爾元帥的調处努力。

我們政府充分察及中共各領袖在理想上是和莫斯科聯繫在一起的。然而鑒于中国当日所存在的勢均力敌的局面，我們的政府認為只有在完成某些条件时，和平方能建立起来。国民党必須把内部加以整頓，双方必須讓步，以使中国政府能够名符其实地成为全中国的政府。並因而使各党派可在立宪的政府体制之內从事活动。国内的和平和宪政的發展，都需要这个面临进行武装叛乱中的强大反对党的一党政府，迅速进步为一个有各党派包括温和的非共党份子参加的真正全国性的政府体制。

这种条件都沒有实现，国共双方虽然有着临时性的停战，以及进行显然很有希望的談判，但国共双方的領袖們互不信任，成見太深，甚至無法获得最后的協議。此外，国民党曾于一九四六年，不顧馬歇爾元帥的警告，發動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軍事行动。馬歇爾警告說，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經濟的混乱中，最后更將摧毀掉国民政府。馬歇爾元帥指出，国民党軍隊虽然能够在一個时期內，攻佔共产党佔領下的城市，但他們决不能摧毀共产党的軍隊。因此国民党部队的每一推进，都將使他們的交通線暴露于共产党游击队的攻击之下，並被迫撤退，或者連同美国所供給的軍火投降。沒有一个对軍事情况的估量，比这更完全地为后来發生的事实所証明。

美国無論在和平或战争时期，对中国人民都維持着友誼与援助的傳統政策。自从对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以贈予和借貸的方式給予国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国的援助总数約达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价值上等于中国政府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果就国民政府的預算而言，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在比例上，較战后美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数量为大。除这些贈予和借貸外，美国政府曾以大量的軍用与民用的战时剩余物資賣給中国政府，其採买原价总值在十亿美元以上，而通过協議，美国政府仅取得二亿三千二百万美元。然而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由于国民党領袖們在軍事上之愚昧，他們的叛变投降和他們部队之丧失斗志，美国供給中国軍隊的軍需品之大部份，已落入中共手中。

有人吁請再拿比較少数的援助——軍事的与經濟的——給予国民政府，能使国民政府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美国政府所获得的最可信賴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报告，並不証实此种見解的得当。

根据现实的情况，估量未来的中国，所得的一种结论，即美国所能走的唯一的另一条路，是为一个已经失掉了它的人民的信心的政府，进行全面干涉。此种干涉需要化费更多的金钱，甚至比迄今为止无效果地用去的钱还要多，需要由美国军官指挥国民政府的军队，並可能由美国武装部队——陆、海、空——参加，因而发生战事。惟如此大规模的干涉，而且完全违反我们的传统政策，势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並將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

必須坦白承認，美国的援助中国人民抵制任何外国或者若干外国控制的政策，現在已面临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腹地，已在共产党人手中，共产党領袖已捨棄他們中国的遗产，而且已公开宣佈他們附从于一个强国——苏联。这个强国在过去五十年來，在沙皇統治下，或在共黨統治下，都一样的十分勤謹的努力于扩充它在远东的控制权。在不久的过去，外国之企圖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的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艰厉的而于最后終获成功的抵抗。我們的援助与鼓励，曾幫助他們抗战，但是在这一次，外国之控制，遮掩在一个广大的热烈运动的外表后面，这个运动显然在許多中国人看来，是完全本地的和民族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們的援助一直無效。

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祥結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經做过的或能够做到的种种措施，都不能改变这个結果。美国所沒有做的种种措施，也不会影响和改变内战的結果，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品，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試圖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中国国内已經达到了一种定局，縱即这个定局，只是因为未尽职责的結果。

現在已經非常清楚，就是我們应当面对一个事实上已存在的局勢。如果把我們的政策建基于所願望的想法，我們將不能帮助中国或我們自己。我們仍旧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国的局面無論可能是怎样悲惨，無論中国龐大人口中的一主要部分，可能怎样殘酷地处于为一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剝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終將再起，中国終將推翻外来的羈絆。我認为我們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發展，这些發展在現在或將來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

然而在最近之將來，我們在执行我們对华友誼的传统政策方面，必將深切地受到目前發展的影响。中国人民認清共党政权並不为中国利益，而为苏联利益服役的程度，以及在辨明事实之后，对这种外来統治所生的反应，都必然会影响到我們的政

策。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假若共党政权服膺于苏联帝国主义的目的，並企圖从事侵略中国的鄰邦，則我們和联合国其他會員国，势必遭遇一种違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則，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面。

同时，我們的政策，將繼續以我們自己之真誠，尊重宪章，我們之对华友誼，我們之傳統支持門戶开放，及中国独立領土主权完整为基础。

此致

总统

迪安·艾奇遜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于华盛顿国务院



# 中美关系大事紀年表

- 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 訂立望厦条約，第一次中美条約（顧盛条約）。
-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訂立天津条約（列威廉条約）。
-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訂立华盛顿条約（蒲安臣条約）〔天津条約續增条款〕。
- 一八九九年九月——  
一九〇〇年三月 海·約翰国务卿發佈关于門戶开放的照会。
- 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 美国宣佈关于保持中国領土与行政完整的对华政策。
- 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 中美續議通商行船条約在上海签字。
- 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 日俄战争結束訂立朴資茅斯条約。
-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簽訂罗脱高平协定。
-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月 諾克斯提出滿洲铁路「中立化」計劃。
-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辛亥革命爆發。
-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 滿清退位，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 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蒲萊安国务卿声明反对日本侵华的二十一条。
- 五月 十一日 蒲萊安国务卿声明否認妨害美国在华条約权利的任何中日条約。
-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中国正式对德国宣战。
- 十一月 二日 簽訂藍辛石井协定。